

10. 羅運治，〈康熙帝與木蘭圍場的關係〉，《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頁393~435。
11. 蔣武雄，〈遼與五代政權轉移關係始末〉，台北：新化圖書，1998。
12. Denis Sinor, *Inner Asia: A Syllabu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 蔣武雄，〈耶律休哥與遼宋戰爭〉，收入：《宋史研究集》第二十八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463~498。
14. 陶晉生，〈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1984。
15. 蕭啓慶，〈北亞游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收入：中國通史教學研討會（編印），《中國通史論文選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1991），頁353~366。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先驅

— 李大釗史學思想之研究

林秋志 *

一、前言

自1902年梁啟超首倡「新史學」以來，至今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也將近有百年的歷史了，而作為中國現代史學主要思潮之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說是舉足輕重，不論學者稱其為「史觀學派」、「釋古派」、或是1949年後的「中共史學」。這些名稱有時容易陷入化約主義的陷阱，而忽視了整個中國馬克思史學發展中的歧異與紛雜。不過相較與對其他史學流派或史學革命的研究，如顧頡剛所引領的疑古思潮、傅斯年所倡的「史料學派」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演變的研究成果卻極為有限。（註一）可見這塊領域還需要更多的史學工作者加以投入。這對釐清整個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與演變，可以說是相當具有關鍵性的。

有關李大釗的研究著作已經有些成果，但這些研究大多限於幾個課題，如李氏與中國共產黨的發展、五四運動、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李大釗個人的傳記與思想研究等。並沒有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角度切入的專著，大部份多為單篇論文，或在闡述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中，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中，以一節或一章的篇幅來分析說明李大釗的史學思想，但內容不是過於粗略就是受意識型態所制約（下面會介紹評析）李大釗作為一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先驅者，其重要的地位與影

* 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註一：有關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成果，可參閱潘光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省思與回顧—以中、英文資料為主〉（上），《大陸雜誌》第九十四卷第二期。

響是不容忽視的。(註二)然而對此研究著作卻相對地稀少，於是筆者想要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演變的角度，來分析李大釗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為何。

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有兩方面，一是單篇的論文，主要有：劉茂林，〈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奠基與李大釗〉(註三)、葉桂生，〈李大釗的史學思想〉(註四)、韓一德，〈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註五)、曹木清，〈論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歷史觀〉(註六)等。一是以章節的方式來描寫李氏史學，如桂遵義，《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註七)、以及桂遵義、袁英光的《中國近代史學史》(註八)。這些文章有一個共同的毛病，即受意識型態影響甚偉，例如劉茂林在談到近代中國歷史學的發展時說：「中國歷史學發展到近代，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變革。第一次變革是在二十世紀初期，資產階級史學伴隨著本階級走上政治的舞臺而出現，為中國史學別開一生面。…第二次變革發生於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和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必然結果。這一變革使中國歷史學真正地步入科學之林。」(註九)、這種將清末以來的中國新史學的發展簡單視為資產階級史學，而五四之後李大釗所代表的是科學、進步的史學，即唯物史觀。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其實掩蓋了許多的問題。

例如這樣的論法明顯帶有歷史決定論的色彩，即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接續資產階級史學是「必然的結果」、其次也無法反應當時史學界的真實面貌，其實中國現代史學進入學院恰是李氏開始倡導馬克思主義之時，如朱希祖之入主北大歷史系。而民初的另一史學革命，即顧頤剛所引發的疑古思潮，以及傅斯年所領導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也都在 20 年代後產生。故簡單將上述三者稱為資產階級史學似乎過於簡化中國現代史學的內部發展。忽視了同時共存的史學潮流。而在這種線型進步史觀

註二：李大釗是否可以被認為是一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這點在大陸學者、及香港學者如許冠三中並無爭議。不過臺灣史學工作者潘光哲卻認為李大釗並不能算是，其理由見上注頁 76。不過筆者認為潘氏的論點其實還可討論。

註三：劉茂林，〈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奠基與李大釗〉，《史學史研究》，1984 年第四期。

註四：葉桂生，〈李大釗的史學思想〉，韓一德、王樹棟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集》(下)(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註五：韓一德，〈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韓一德、王樹棟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集》(下)(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註六：曹木清，〈論五四時期李大釗的歷史觀〉，韓一德、王樹棟編《李大釗研究論文集》(下)(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註七：桂遵義，《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

註八：桂遵義、袁英光，《中國近代史學史》(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註九：劉茂林，〈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奠基與李大釗〉，頁 1。

描寫下的李大釗，就像個擁護真理的鬥士一般，在對抗各種反動、落後、唯心的資產階級史學。然事實上，李大釗身上也有繼承清末以來新史學的因子，從而影響著他的史觀，可是大陸學者卻忽視或隻字不提。而且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 20 年代以後的蓬勃發展，也不是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的必然結果。事實上，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如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馬克思與恩格斯經典著作的翻譯傳入、知識界學風的轉向等，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

臺灣方面對於李大釗史學思想的研究，不論專著或單篇論文都告闕如。(註十)而香港方面，許冠三的《新史學九十年》(註十一)中則以一章專門論述李大釗。首先許氏將李大釗歸為「史觀學派」(上)，與其並列的有朱謙之、常乃惠、雷海宗。這樣的分類似乎有相當大的問題，因為此四人的差異，尤其是李大釗與其他三人相當的明顯。而許氏在處理「史觀學派」(下)時，主要論述人物為郭沫若、翦伯贊、范文瀾。很明顯的都是馬克思主義史家，似乎將李大釗歸於此會較適合些。而就李大釗章本文來說，基本上許氏較無大陸學者有明顯的意識型態束縛，比較能客觀地論述李氏的史學。不過此文還是有些缺憾。首先許氏對整個時代思潮的背景交代不夠，而有關李氏本人的學術思想傳承及其轉變也相當簡略。最大的遺憾在於許氏對李氏的解讀只就其著作作文本分析，並無把李氏放在中國現代史學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脈絡下來看，這是比較遺憾之處。

本文的寫作方式與章節的安排，共分為五節，第一節：「前言」，主要為研究回顧與研究架構的提出；第二節：「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形成」，主要分成三部分來描寫，首先論述清末以來新史學的發展，其次為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及其早期在史學上的運用，最後分析李大釗早年思想之發展以及後來如何轉向馬克思主義者。第三節：「李氏史學思想之評析」，希望從李氏的著作中找出其馬克思史學理論的來源為何、其史學的中心觀是什麼，以及其如何利用理論在實際的研究方面，成果如何等。

註十：至今以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只有潘光哲的《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的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6 月。至於為什麼臺灣在這方面的研究稀少，筆者認為有三點：一是基本上對於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研究，原本就比較少，而且早期多放在幾位重點人物，如梁啟超、顧頤剛、傅斯年；或是派別，如疑古學派，或論爭如 30 年代的社會史論戰等。第二，是臺灣史界早期多是繼承傅斯年的史料學派，對於歷史理論一向採輕視的立場，對於現代史學史的研究相對比較不熱衷。第三，乃是臺灣社會的影響，在 1987 年解嚴以前，臺灣政府基本上採反共的立場，研究「馬克思主義」基本上除了所謂的「反共專家」以外，對於一般史學工作者來說可謂是一種禁忌，這同樣造成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起步甚晚的原因之一。

註十一：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台北，唐山出版社，1996)

第四節：「李氏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論述李氏史學對後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何關聯和影響，實例上則以第二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郭沫若來作比較。最後第五節：「結論」，對李氏史學作個總討論，期能釐清李氏史學的主要特色、貢獻為何，最後探討就整個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脈絡下，如何看待李氏史學所代表的意義。

二、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形成

（一）清末民初的新史學思潮

一個史家的形成除了主觀的個人成長經驗外，往往與客觀的時代思潮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故本章首先論述二十世紀中國新史學思潮之興起有何特色，此外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又是如何。這在研究李大釗史學思想之演變時，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背景。

中國二十世紀新史學的興起（註十二），首倡「史界革命」者當然是梁啟超在1902年發表的《新史學》一文。（註十三）此文主要有兩大部份，一是批評中國傳統的舊史、一是對其所倡的「新史學」作一界定。從新史學一文中我們可以提煉出梁氏之新史學的史觀主要有三種：一是「進化史觀」；而且這種進化史觀明顯帶有進步的色彩，故其在文中批評孟子的循環史觀，認為應遵從孔子之義（此指公羊三世的進化論）（註十四）。一是「國族史觀」：其云「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競爭而已」、「歷史生於人群，…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此實數千年世界歷史經過之階級，而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也。」（註十五）。其三，則為「科學史觀」，即梁氏認為作歷史研究不能脫離歷史哲學，其謂：「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梁氏的歷史哲學認為必須從歷史中求得一種「定律」，這種定律不是為了只是理論上的美觀，而是可以「將以施諸實用，將以貽諸來者。」從其論述中可看出

註十二：關於中國新史學之興起的過程可參閱，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學林》，第四輯，民國三十年二月。

註十三：有關梁啟超之新史學較詳細的分析論述，可參閱汪榮祖，〈梁啟超新史學試論〉，《近代史研究集刊》第二期。

註十四：梁啟超，《新史學》，頁11—12。

註十五：梁啟超，《新史學》，頁16。

其認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在本質上並無不同，皆可尋得「公理公例」。（註十六）

此文也可看出新史學一開始即有兩種主要的特色，首先是深受西方理論的影響，如前謂的「進化」、「國族」、「科學」三種史觀，雖然梁氏常有以中國傳統加以補綴，然骨子裡皆有濃烈的西方思潮的色彩，如進化史觀很明顯乃是受達爾文主義之影響。而後的新史學的發展如李大釗等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以及傅斯年為代表的「蘭克史學」，也是如此。其次，是有很強的實用性格，其實「致用」一直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特色之一，可是新史學的致用乃是來自於西方衝擊的影響，亦即將「史學」視為「救亡」的途徑之一。如梁氏所謂：「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不肖所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註十七），這樣的實用性格到五四後主要為馬克思主義史學所繼承，而新史學的另一支史料學派則是將實用性質加以拋棄。這可以說是新史學自梁啟超以來最大的分流了。

（二）馬克思主義之傳入及其早期在史學上的應用

馬克思主義的引進中國以及後來形成新史學的一支，基本上可分為兩個階段來看，而其中的分水嶺則是1917年的俄國革命。因為馬克思主義第二階段發展與李大釗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故放在論述李大釗部份。以下先說明馬克思主義早期如何引進傳播，以及如何在俄國革命後，首先為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者引進歷史研究領域的情形。

中國人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而當時馬克思主義是以作為社會主義的一支被介紹到中國。根據史料顯示，中國報刊提到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1899年2月，由上海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第一二一號與一二三號上，刊出由李提摩太翻譯、蔡爾康筆述的《大同學》，此書原為英國進化論者班傑明·頤德（Benjamin Kidd）的著作《社會演化》（Social Evolution）的前四章。上海廣學會在一八九九年將全書校刊出版。在《大同學》中曾多次提到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字樣，如其謂「近代學派，有講安民新學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克

註十六：梁啟超，《新史學》，頁13—16。

註十七：梁啟超，《新史學》，頁9。

思，主於資本者也。」（註十八），然事實上，頡德此書的目標是嘗試結合非理性主義的宗教與生物進化論的學說，書中藉馬克思的言論與其他社會主義流派的觀點，論證要消除社會的分裂狀態，必須求助於超理性的宗教力量。（註十九）頡德此文也影響了梁啟超，而梁氏可說是國人第一位撰文介紹馬克思主義，其於1902年新民叢報十八號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提到了「麥喀士之社會主義」，1904年梁氏〈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再次提及「麥喀士」（Karl Marx），認其思想為德國最有勢力的思潮，「近年來世界之特產物」。（註二十）

中國知識份子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來源，除了西方傳教士的片面與批評之介紹來源外，另一來源是經由日本。當時隨著中國留日學生的增多，接觸了當時正在日本盛行一時的社會主義學說，不少這方面的日文著作陸續譯成中文發表。例如，在1903年3月，上海廣智書局出版了由趙必振翻譯日人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一書，書中專章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活動及其學說，並因原作者摘引了《共產主義宣言》中的最後一段話，這是首度譯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典著作。（註二一）

不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內容做出比較準確的介紹，並直接摘譯馬克思與恩格斯原著文字以作為引介、批判之資的乃是革命黨人朱執信。其於1905年10月民報第二號上發表了〈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一文，他詳細的介紹了馬爾克（馬克思）、媽及爾（恩格斯）的生平與業績，並把1848年的《共產主義宣言》加以摘錄（第二章的部份內容）（註二二）。此外也提到了《資本論》，這是中國人第一次著文介紹《共產主義宣言》，以及直接翻譯了此書的部份內容。除了革命黨外，當時在日本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也在其機關報《天義報》上為文介紹馬克思主義，如1908年1月的《天義報》第15卷，就刊載了民鳴翻譯的恩格斯於1888年為《共產主義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全文，標題為〈共產黨宣言序文〉，這是至今查到的恩格斯著最早的一篇完整中譯文。此外，《天義報》也陸續發表了《共產主義宣言》的部份內容。

註十八：林代昭、潘國華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3），頁3。

註十九：劉興華，《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一八九九—一九二三）》，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6月，頁10。

註二十：呂芳上，《革命之再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278。

註二一：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的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6月，頁14。

註二二：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278。

（註二三）

總的來說，在清末馬克思主義其實只是作為社會主義的一支被介紹進入中國，其早期的傳播與發展常常顯得支離破碎，或被曲解，並無引起很大的反應，更遑說利用馬克思主義作為史學研究的理論了，這樣的情形直到俄國革命之後，才見改變。

自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馬克思主義開始風靡全國，也因此有人開始以馬克思主義來考察中國歷史，然最早有此意識以及加以運用的，並非共產黨員而是國民黨人胡漢民與戴季陶。胡漢民可說是近代中國第一位以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哲學及倫理制度的人。而「經濟關係是社會一切關係的基礎」是這一時期胡漢民討論問題的基本觀點，這顯然是受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影響。胡氏以此研究的主要文章有〈中國哲學史之惟物的研究〉、〈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等，其把一切思想的變遷，拿經濟生活的影響來作解釋。而就戴季陶而言。其傾心於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在這段時期內尤為激烈，此接可見諸他從唯物史觀來解釋、分析中國社會問題的兩篇重要文章：〈從經濟上觀察中國之亂源〉、與〈經濟的倫理觀〉。（註二四）

胡漢民和戴季陶雖然很早就呈現以馬克思主義來分析中國社會、解釋中國歷史的成果，然則他們的分析與論斷，整體來說帶有濃厚的折衷主義的色彩。如胡漢民以唯物史觀解析中國傳統大家庭制度的弊端時，一方面主張改造社會經濟組織，一方面也主張發展人類自愛、愛他的本能，實現全體社會的友愛。後者這種論調其實已超出歷史唯物論的範疇了。此外胡氏與戴氏對於馬克思主義中的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等理論顯然也不表贊同。（註二五）由此可知胡漢民等人其實僅僅利用歷史唯物論作為分析歷史的工具之一，並不需要全盤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所有層面。而且其本身也無自我意識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以雖然他們可視為最早利用歷史唯物論來分析中國社會、歷史的知識份子但卻不能被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註二六）

註二三：林代昭、潘國華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從影響的傳入到傳播》，頁10—11。

註二四：呂芳上，《革命之再起》，頁289—317。

註二五：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的討論》，頁19。

註二六：在此或許應該說明一下何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筆者個人的認為主要有二個條件：一、必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第二、有意識地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去探討歷史的問題。是以只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並非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家，如陳獨秀。而僅僅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歷史研究上，而非馬克思主義者，也非，如上述胡漢民、戴季陶等人。

(三) 李大釗早期思想之演變及轉向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1月28日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1927年4月28日被處死於北京，享年39歲。在其短暫的一生中約可分為四個時期：一、少年成長期（1889至1907），二、青年求學期（1907至1916），三、轉向馬克思主義時期（1916至1921），四、激進革命期（1921至1927）。而對其思想形成較重要的階段為第二與第三時期。（註二七）

李氏在出生前父親李任榮已經去世，而其母親因感傷過度，在生下他以後不到十六個月，也相繼逝世。大釗從小孤苦伶仃。正如他後來在《獄中自述》中所說的：「在襁褓中，及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姊妹，唯一垂老之祖父撫養成人。」（註二八）其幼年在鄉下就讀私塾，曾跟過三位舊式老師，主要閱讀為四書經史，且在十六歲那年曾應科舉考試，沒有考上。後因科舉停辦，於是進入永平府中學就讀兩年後，因「感於國勢危迫，急思身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註二九）1907年李氏順利考上此校，讀了六年，主要是學習法政相關科學以及英、日語。1913年畢業後，李氏仍感學識不足，想繼續深造，於是東渡日本，於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繼續其求學生涯。直到1916年因洪憲帝制之故，毅然放棄學業回國，為改革時政奮鬥。自此進入其學思生涯的第三階段。

在青年求學時期，從李氏所發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其思想有幾項成為後來一生中不變的特色，一、以其法政專業學養批判時政。二、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三、論證批評時常帶有歷史之思維與深度，有文化相對論的色彩，著重「國情」。例如其最早的一篇文章《隱憂篇》，寫作於1912年六月。主要內容指出民國成立以來，動盪不安。李氏認為有六大隱憂：邊患一、兵憂二、才困三、食艱四、業蔽五、才難六。而導因則為三：一黨私，二省私，三匪氛。此篇文章較值得注意之處有：當其談論黨私時，謂「黨非必禍國者也。」其明白辨別現代政黨與傳統朋黨之不同，並不盲目攻擊「黨」。「凡立憲國之政治精神，無不寄於政黨，是政黨又為立憲政治之

註二七：由於第四時期與本文關係較不密切，故並不敘述此階段李氏的作為，欲深入瞭解者可參閱：《李大釗傳》編寫組，《李大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註二八：《李大釗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888。

註二九：《李大釗文集》（下），頁888。

產物矣。」而「試觀今日之政黨，爭意見不爭政見，以至於此，且多假軍勢以自圖，則將來黨爭之時，即兵爭之時矣。黨界諸君子，其有見及此者乎？盍早圖之。」（註三十）此外在另一篇論及有關國會一院制與二院制的爭論時，其批評常持有歷史的角度，如謂「二院制乃英倫歷史上之遺物，至今已成強弩之末，蓋英倫當時情勢，有階級之間，故其制度為時勢所造成，則兩院制之成形，實有特殊之原因。」、「然英倫晚近政局，隨社會革命之大勢，其上院幾為告朔之羊，而無絲毫之力，足與眾院相頡抗。則英倫今制，形式上雖為二院制，實際上則為一院制。」（註三一）這樣的論證常使其文章更加有力，較能說服人。

在其青年求學階段總共發表了35篇文章。裡頭有八成都是政論式的文章。除了前面所說的三種特色外，此期還有一篇文章是與後來十分不同的，即有關儒家思想。李氏於日本就讀第一年時，在《甲寅》雜誌第一卷第三號（1914年8月10日）發表了一篇名為〈風俗〉的文章，通篇充滿了儒家思想，推崇儒家的「道德政治」、「士眾與之赴義。風之以利者，眾與之赴利。顧群樞之所在亦因世運之隆污而殊。」、「仲尼之論政也，有風行草偃之說，垂上好下甚之戒。匡稚圭之疏政也，亦曰：『朝廷者，天下之楨干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完全是一副儒者論政的樣子。其最後總結：『亭林所謂“匹夫之責”，滌生所云“一命之士”，拯救國群，是在君子。雖已不肖之陋，亦將其匹夫之所從之。』」（註三二）可見在當時李氏對於儒家傳統尚未加以攻擊排斥，不似兩年後稱「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註三三）

故簡而言之，李氏在青年求學的階段，其主要的立場是支持立憲共和，而其理論上的應用多以其專業學養為主，此外則深受儒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的淑世精神所影響。至於對於歷史的演進還是著重於菁英式之人物（及其所謂的「群樞」），有些英雄主義與唯心論（強調意志）的色彩。雖然在其留學日本之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也是社會主義思潮風行的階段，但從其發表的文章看來，並沒有明顯的社會主義色彩。不過，李氏多少應有閱讀過此類書刊，對其以後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吸收應有些助益。

註三十：《李大釗文集》（上），頁1—2。

註三一：〈一院制與兩院制〉，《李大釗文集》（上），頁52。

註三二：《李大釗文集》（上），頁90—94。

註三三：〈孔子與憲法〉（1917.1.30），《李大釗文集》（上），頁258。

自 1916 年 5 月歸國到 1921 年 7 月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這段時期，可謂是李氏學思生涯中，重要的轉折期。其從一默默無名的青年學生，一舉成為全國知名的政論家、教授、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以至中國共產黨的創始黨員。在這短短五年之間，思想上也從自由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1916 年回國後，李氏先後擔任《晨鐘報》（《晨報》前身）、《甲寅》日刊、《每周評論》、《新青年》等編輯，總計發表了 288 篇文章（佔其一生總數的 75%）（註三四）。1918 年接任章士釗成為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1920 年擔任北大教授，開始在北大、女子高等師範、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學校講授史學、社會學、甚至唯物史觀等課程。在這段轉向馬克思主義時期，李氏最主要的角色應為政論家、學者、以及馬克思主義宣傳家。

李氏一回國時並未馬上轉向社會主義甚或馬克思主義，這時比較濃厚的思想傾向有三：一、開始反傳統尤其是儒家傳統；二、自然進化論；三、自由主義。在其主編的《晨鐘報》創刊號中，其發表〈「晨鐘」之使命—青春中華之創造〉一文中，已開始有些反傳統的傾向，其將過去與未來一刀二分，如「過去之中華，老輩所有之中華，歷史之中華，墳墓之中華也。未來之中華，青年所有之中華，理想之中華，胎孕中之中華」，其之所以強調「青年中華」主要是受到「青年德意志」運動之影響，因李氏認為此運動使德意志統一，並且壯大。而且認為「今日之中華，猶是老輩把持之中華也，古董陳列之中華也。」故青年們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由來之歷史，一舉而摧焚之，取從前之文明，一舉而淪葬之。」（註三五）而後又因《天壇憲草》第十九條規定「孔子之道必須是國家教育中人格培養之基礎」，引起激烈爭辯。（註三六）李氏也撰文加以抨擊，因而大肆攻擊孔子。其重點在於孔子與憲法是不能兩容的「孔子者，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也。憲法者，現代國民之血氣精神也。……孔子者，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也。憲法者，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專制不能容於自

註三四：而自 1921 到 1927 年七年之中只發表了 60 篇，約佔其一生總數的 15%，由此可見，自其成為共產黨員之後，其政論家的色彩比重已逐漸降低，而成為積極活躍的革命家了。（當然也是要考察其這段時間的種種作為才能論斷），而其論文在這段期間減少的另一原因，乃是李氏在 1924 年後即為北洋政府明令通緝，其所能撰文的刊物也紛紛被禁，不似以往那麼容易發表文章了。

註三五：《李大釗文集》（上），頁 178—181。在此階段李氏以青年、老年對比，強調青春的文章尚有〈青春〉，《新青年》二卷一期、〈奮鬥之青年〉，《晨鐘報》1916 年 9 月 3 日、〈青年與老年〉，《新青年》三卷二號，等等。

註三六：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 400—401。

由，即孔子不當存於憲法。」（註三七）李氏其實也並非盲目攻擊以及全面否定孔子，其主要是依據「自然進化論」與「時代精神」等論據來說明「孔子生於專制之社會，專制之時代，自不能不就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立說，故其說確足以代表專制社會之道德，亦確足為專制君主所利用質以為護符也。……而無如其人以為殘骸枯骨，其學說精神，已不適於今日之時代精神何也！」，故其總結「吾人為謀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進展，企於自然進化之程，少加以人為之力，冀其迅速蛻演，雖冒毀聖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註三八）由此可知，李氏之反儒家反傳統主要是依據自然進化論，認為孔子學說於今已「不合時宜」了。

至於自由主義思想，在其另一篇駁斥將孔子之道入憲的文章〈憲法與思想自由〉中也有闡明，其云「西諺有云『不自由無寧死』。夫人莫不惡死而貪生今為自由故，不惜犧牲其生命以為代價而購求之，是必自由之價值與生命有同一之貴重，甚至遠在生命以上。」其又以最早的憲法憲法創始國為例「自有英之『大憲章法』之人權宣言為近世人類自由之保證書，各國憲法莫不宗為泰斗，如身體自由、財產自由、家宅自由、書信秘密自由、出版自由、教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信仰自由，皆以明文規定於中」，李氏又抨擊傳統認為「吾國自秦以降，其為吾人自由之敵者，惟皇帝與聖人而已。」（註三九）此外，李氏在另一篇〈議會的言論〉中則直接引用英國自由主義大師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依于公信而禁獨伸之議者，其為惡浮於違眾議而禁公是之言，就使過去來三世之人所言皆同，而一人獨持其異。前之諸同不得奪其一異而使同，由後之一異不得強其諸同已從異也。」來強調言論自由之不可侵犯性。（註四十）值得注意的是，此篇乃寫於俄國革命前夕，由此可知基本上此時李氏的立場還是偏向自由主義的，與當時的大部份知識份子並無明顯的不同。（註四一）

「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註四二）誠如許多知識分子李大釗之所以轉向馬克思主義，最大的原因之一，乃是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不過李大釗可謂是最早轉向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之一，這與他一直觀察歐洲戰事

註三七：〈孔子與憲法〉，《李大釗文集》（上），頁 258—259。

註三八：〈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1917.2.4），《李大釗文集》（上），頁 264。

註三九：〈憲法與思想自由〉（1916.12.10），《李大釗文集》（上），頁 244—245。

註四十：〈議會的言論〉（1917.2.22），《李大釗文集》（上），頁 314。

註四一：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頁 406。

註四二：〈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頁 1408。

與俄國的革命有密切的關係。1918年7月1日，李大釗在《言治》季刊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一文，其雖稱「俄國今日之革命，誠與昔者法蘭西革命同為影響於未來世紀文明之絕大變動。」、「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邑者也。」，但詳讀內文可知李氏尚未清楚十月革命的工農性質，以及其與馬克思主義、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之間的關係。如其還希望俄國傳統的「人道主義」精神，能像法蘭西革命時的愛國精神一樣來恢復秩序，重建組織。（註四三）

李氏開始比較清楚理解並且認同俄國十月革命，在下述兩篇文章中開始顯露出來，一是〈庶民的勝利〉；一是〈Bolshevism的勝利〉，同時發表於1919年1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前篇之作主要是為了慶祝一次大戰的結束以及勝利，其認為這次大戰的結果有二：一是政治的、一是社會的。政治的是「『大……主義』」失敗，如大日爾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等，以及民主主義的勝利。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的失敗，勞工主義的勝利。李氏在此指出一次大戰的主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國家的界線以內，不能容納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大戰，把國家的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的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註四四）李氏的這種分析，以及所用的術語，已經完全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分析問題的方式了，雖然還很粗糙。而其立場也很明顯傾向勞工，認為德、俄的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註四五）

在〈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中，李藉著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談話與著作，以及西方記者的評論，呈現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內容與性質，其發現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奉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革命社會主義，企圖聯合世界的無產階級打破資本家獨佔生產利益的經濟制度，創造一個自由鄉土。且李氏也相信俄國十月革命引起的世界群眾運動，會讓歷史上的殘餘物，如皇帝、貴族、軍閥、官僚、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全數被摧毀，新的世界也因俄國革命的成功而到來。（註四六）

1919年9月由李大釗所主編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馬克思研究專題」中

註四三：〈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7.1），《李大釗文集》（上），頁572—575。

註四四：〈庶民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頁593—594。

註四五：〈庶民的勝利〉，《李大釗文集》（上），頁595。

註四六：劉興華，《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1899—1923）》，頁86—87。

，李氏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至此其已完全轉向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要先驅了。（註四七）

三、李氏史學思想之評析

李氏在1919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後，等於正式公開宣佈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隨後於1920年李氏陸續在北大史學系開設「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概論」；在經濟系開設「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在法律系開設「社會主義」，還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講授「女權運動史」、「史學思想史」、「社會學」、「圖書館學」等（註四八）。值得一題的是李氏乃是中國第一位在大學歷史系裡面開設「唯物史觀研究」。其所代表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註四九）下面就李氏有關史學的相關論文加以分析李氏的史學思想。（註五十）

（一）歷史是社會的變革

什麼是歷史？李大釗在其著作《史學要論》第一章即是「什麼是歷史」，其先說明以往的「歷史」如《史記》、《資治通鑑》、《二十一史》乃至Herodotus的《希臘史》等，皆非歷史，這些只是「歷史的記錄」，是研究歷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說他們就是歷史。而我們所要研究的，應該是活的歷史，不是死的歷史；活的歷史，只能

註四七：至於李氏在本篇中的主要思想論據，將放在下一章中，談論其史學思想時再加以引用，在此並不加以分析說明。

註四八：《李大釗年譜》編寫組，《李大釗年譜》（甘肅，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頁116。

註四九：其實這原本代表的意義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學院的過程，這給了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其他史家對話的機會，可惜的是，自1924年李氏被通緝後，此線就被斬斷。而1949年中共上台後，馬克思主義成為學術研究的無限上綱，在史學方面造成獨尊的局面，其實這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並無益處，因為其又斬斷了與其他史學理論對話的機會，又將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教條，也就是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所批評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vulgar-Marxism），參見氏著，〈Karl Marx's contribution to history〉，《*Digene*》，No.64，故今天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對世界史學界而言，並無造成多大的貢獻。（當然這也是大部份共黨國家的現象）。至於臺灣呢？誠如前面所言，臺灣在解嚴前為「反共」政策所拘，二為臺灣史界早期多為史料學派學者所據。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名在大學歷史系開課，竟然要到1997年周櫟楷師於台大歷史研究所開設的「後現代與馬克思主義的史學」。這與當初李大釗開「唯物史觀研究」足足差了77年。也就是說在臺灣方面到了1997年馬克思主義史學才又重新進入了史學界，與其他史學理論進行對話。

註五十：李氏的史學相關論文主要有其在北大開設的「唯物史觀」講義共七講，「史學思想史」十一講。每講的題目可參閱《李大釗年譜》編寫組，《李大釗年譜》附錄，頁276—277。此外還有其於1924年發行的《史學要論》一書，收入於《李大釗文集》（下）。以及其他相關論文。

在人的生活裡去得，不能在故紙堆裡去尋。那李氏所謂「活的歷史」又是什麼意思呢？「簡明一句話，歷史就是人類的生活並為其產物的文化，…亦可以說，歷史就是社會的變革。」、「把人類的生活整個縱著去看，便是歷史；橫著去看，便是社會。」李氏這樣對歷史的定義自承是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的。（註五一）李氏的歷史觀，基本上是服膺於馬克思主義史學。如其說「自有馬氏的唯物史觀，才把歷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績，實為史學界開一新紀元。」（註五二）。而李氏唯物史觀理論的來源，主要則是來自馬克思作品中的《哲學的貧困》（1847）、《共產者宣言》（1848）、《經濟學批判》序文（1859）（此即《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及《資本論》第一卷（1867）。而最重要的是《經濟學批判》序文，其認為在此馬克思把唯物史觀「公式的發表出來」。（註五三）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二要點：其一是說人類文化的經驗的說明；其二即社會組織進化論。其一是說人類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這是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社會上政治的、法制的、倫理的、哲學的，簡單的說，凡是精神上的構造，都是隨著經濟的構造變化而變化。我們可以稱這些精神的構造為表面構造。表面構造常視基礎構造為轉移，而基礎構造的變動，乃是以其內部促他自己進化的最高動因，就是生產力，為主動；屬於人類意識的東西，絲毫不能加他以影響；他卻可以決定人類的精神、意識、主義、思想，使他們必須適應他的行程。其二是說生產力與社會組織有密切的關係。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須隨著他變動。」（註五四）

基本上，李氏的理解並無多大錯誤，「經濟基礎／精神表面構造」論說與生產方式的轉變導致社會的變革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之一。另外一個則是「社會整體觀」思想，李氏認為以往的科學藉由於過重分類的結果，產生了一種弊病，即忘卻他們只是一個全體的部份而輕視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如「以前把歷史認作只是過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內容，亦解作憲法的和外交的關係。這種的歷史觀，只能看出一部份的真理而未能窺其全體。按著思想界的新傾向（唯物史觀，筆者案）去觀察，人類的歷史，乃是人在社會的歷史，亦是人類的社會生活史。」而「經濟的生活，

註五一：〈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13—715。

註五二：〈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李大釗文集》（下），頁 347。

註五三：〈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李大釗文集》（下），頁 346。而以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所依據唯物史觀的理論來源，也多是從《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而來，然有意思的是，大家擷取的部份卻不盡相同，這在下章正文時，再加以闡述。

註五四：〈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李大釗文集》（下），頁 99。

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條件。…在社會構造內限制社會階級和社會生活各種表現的變化，實是經濟的。」（註五五）

李氏的唯物史觀是否就是「經濟決定論」、「歷史決定論」呢？其實李氏曾對這個問題加以辯駁，首先是「唯物史觀」這個詞，其在〈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中，開章明義就說「唯物史觀」是社會學上的一種法則，後來有四種名稱，在學者間通用，即是「（1）歷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2）歷史的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3）歷史之經濟的解釋（"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及（4）經濟的決定論（"Economic Determinism"）。李氏認為前兩者含意太廣，其認為馬克思之說只是歷史之經濟的解釋。而第四說，「以有傾於定命論宿命論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故其還是稱馬克思說為「經濟的歷史觀」妥當些。（註五六）李氏認為「有些人誤解了唯物史觀，以為社會的進步只是靠物質上自然的變動，勿需人類的活動，而坐待新境遇的到來。因而一般批評唯物史觀的人，亦有以此為口實，便說這種定命（聽天由命）的人生觀，是唯物史觀給下的惡影響。這都是大錯特錯，唯物史觀及於人生的影響乃適居其反。」（註五七）李氏首先論證以前的歷史多將特權階級置于超自然的權力保護之中，將歷史解釋歸於天命。使得一般民眾認定自己境遇的苦難，多是由天命所決定，故任何想以自己的努力以自救都是枉然，只能服膺於現有的秩序。這樣那些據高位者才能永保其特權，而一般人民，則將永沉在物質道德的卑屈地位。故「這種史書，簡直是權勢階級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實實的聽他們採奪。」（註五八）

而唯物史觀所取的方法，則全不同，他的目的，是為了得到全部的真實，及其對人類精神的影響，就與前述相反。怎麼說呢？李氏認為唯物史觀是一種社會進化的研究，而社會一語乃是包含「全體人民」，這與特別事變、特別人物沒有什麼關係。而生長與活動，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質去尋，絕不在他們以外的什麼勢力。簡單的說促進「社會的變革」的力量乃是全體人民並非是菁英聖賢，而當人們有這樣的認知之後，就會從以往一個被動的、否定的生物變成一個活潑積極的份子。故李氏總

註五五：〈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頁 360。

註五六：〈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頁 359。此外李氏在另一篇文章〈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與理愷爾的歷史哲學〉中也提到「唯物史觀」不是馬氏自己用的名稱。此名稱乃是馬氏的朋友恩格斯在 1877 年始用的。《李大釗文集》（下），頁 346。

註五七：〈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頁 364—365。

註五八：〈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頁 362—363。

結地說，舊歷史與新歷史的方法與影響正好相反。「這全因為一則看社會上的一切活動與變遷全為天意所存，一則看社會上的一切活動和變遷全為人力所造，這種人類本身具有的動力可以在人類的需要中和那賴以滿足需要的方法中認識出來。」、「我們要曉得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靠我們本身具有的人力創造出來的，不是那個偉人聖人給我們造的，亦不是上帝賜於我們的。將來的歷史，還是如此。」（註五九）這種從「唯物史觀」推出「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的說法其實與馬克思本人的說法是相當接近的，如馬克思曾云：「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註六十）。

（二）歷史學、歷史理論與記述歷史

李氏在探討「什麼是歷史學」時，其先對中外「歷史」一詞做起源的研究，其認為「歷史」一語的初義都是指事件的記錄而言，足徵歷史學的起源，實起於記錄的歷史。」（註六一）不過，李氏認為這種「記錄的歷史」在今日是不夠的，必須加上新解釋才可以。在此他對史學下了定義：「歷史學就是研究社會變革的學問，即是研究在不斷的變革中的人生即為其產物的文化的學問。」而在今日的史學研究上面，基本上李氏分為兩個步驟一是「沿革的研究」，這是所謂的「記述歷史」；第二是推理的研究，及其所謂的「歷史理論」。簡而言之，就是「今日歷史的研究，不僅以考證確定零零碎碎的事實為必能要事；必須進一步，不把人事看做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做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於全般的歷史事實的中間，尋求一個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實與事實間的互相影響與感應。」（註六二）從這裡才能理解為什麼李氏會說「今日的歷史學，即是歷史科學，亦可稱為歷史理論。」的原因。

那李氏為什麼汲汲於求歷史的一般理論呢？這與他對史學與科學的觀念有關，也就是說李氏基本上認為「史學的性質，與其他科學全無異處。」（註六三）在此曾提出兩種對史家職分的看法：「一說謂史家的職分，不僅在考證個個特殊的史實，

以求其明確；而尋史實相互的聯絡，以明其因果的關係，固亦為必要。然考其脈絡，明其因果關係，以解釋史實，說明其發達進化云者，不過是說單就特殊事例的本身所當作的事；至於綜合全般的歷史以求得一普遍的理法，則非史家所有事。一說則謂史家的職分，不僅在就特殊事例的本身解釋史實，更須匯類種種史實，一一類別而為比較，以研究古今東西全般歷史的事實，唯一般的解釋，明普遍的理法，正為史學家的要務。」（註六四）從文中李氏明白確定史家的職分應為後者。然他的理由卻是「從第一說，則史學與其他諸科學性質迥異，而為一種特別的學問；從第二說，則史學實為與其他科學同性質同步調的東西。」（註六五）由此可見李氏其實認為史學應與其他科學並無不同，不過他認為今日的史學當作一種科學，還處於幼稚階段。這種堅持史學即是一種科學的主張，而這種科學往往等同於自然科學，其實一直中國現代史學的特色。例如以傅斯年為旗手的史料學派也堅稱「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註六六）不過，事實上雖然李氏堅持史學也是科學，但並未因此捨棄掉專以記述論究特殊史實的部份，而認為「歷史理論與記述歷史，都是一樣要緊」、「個個事實的考證，實為一般理論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個個事實的考察，比較的充分施行；而後關於普遍的理法的發見，始能比較明確。」（註六七）也就是說李氏認為兩者是不可缺的。這樣的說法，反而符合余英時想解決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矛盾的論說，即「史料學是史學的下層基礎，而史觀學派則是上層建構。沒有基礎，史學無從開始；沒有建構，史學終不算完成。」（註六八）雖然說李氏所代表的唯物史觀為余英時歸類為「史觀學派」。這樣的矛盾也可看出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家與後來的史家其實是有差異的。

註六四：〈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24—725。

註六五：〈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25。

註六六：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集》（二）（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 979。巧合的是李大釗以下所代表的史觀學派正好是與史料學派相反的派系，結果兩派同樣共尊「科學史觀」。要說明的是，這裡史料與史觀學派的分法，主要是採取余英時的〈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反省與展望〉，收入氏著《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1994）中的說法，而非許冠三的分法（前書）。事實上，余英時的分法只是一種廣義概念上的分析，並非就那個特定史家所做的實際分析，所以說李大釗其實有些部分並不完全符合他的分類，如李氏從未堅持所謂的「五個社會階段說」。

註六七：〈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28。

註六八：余英時，〈中國史學的現階段〉，《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 2。

註五九：〈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李大釗文集》（下），頁 363—365。

註六十：〈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 585。

註六一：〈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20—721。

註六二：〈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26。

註六三：〈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21。

然而在此也可發現李氏史學的一個矛盾點，如前所謂其曾宣稱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已經將歷史學提高到與科學同樣的地位。言下之意是一般的歷史理論應該就是「唯物史觀」，可是在此他卻宣稱「於個個事實的研究多尙未能做到比較的充分的今日，而望歷史理論的系統完全成立，實在是很難。故在今日，於一般理論必要的準備未成的時候，不能認有確實基礎的一般理論完全構成。」從這段文字可明顯看出李氏認為當時一般的歷史理論尙未完成，也就是說歷史學還不能算是「歷史科學」，這與其前對唯物史觀的論斷似乎起了衝突。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衝突呢？筆者認為這與他對「歷史解喻」（李氏用語）的看法有相當的關係。

（三）「歷史解喻」與「史觀不斷前進說」

李氏首先區別所謂的「實在的事實」（又稱為「實在的過去」）、「歷史的事實」（又稱為「歷史的過去」）。「實在的事實」指的就是已經過去的事實，已不能復返。而「歷史的事實」則是對過去事實的一種解喻。所以說對李氏而言「真實的事實」已經是過去消失了，而所謂的「歷史的真實」則是「歷史的事實」，也就是解喻中的事實，而解喻則是隨時變遷的。故其云：「只有充分的記錄，不算是歷史的真實；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是歷史的真實。」故其宣稱歷史的真實，亦只是暫時性的，要時時變；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其認為歷史的真實有二意義：「一是說曾經遭遇的事是正確的，一是關於曾經遭遇過的事的解喻是正確的。前者比較的變動少，後者則是時時變動。解喻是對於事實的知識，知識是天天增長的，天天擴大的，所以解喻是天天變動的。」（註六九）這樣將「實在的事實」與「歷史的事實」加以區分的說法，在當時的中國史界是僅見的。如英國史家卡耳（E. H. Carr）提出「事實」與「歷史事實」區分已是 1961 年之事了（註七十），而李氏早在 1920 年就有這樣的看法，實是令人驚異的。（註七一）雖然說李氏與卡耳的分法其實還是有些差異（註七二）。此外李氏的「歷史解喻說」對當時的中國史學界而言，其實遠較其他史家更接近當今對史學的看法，如較李氏稍晚的傅斯年對史學的看法，則束縛於對「客觀史料」

註六九：〈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17。

註七十：參見 Edward H. Carr 著，王任光譯，《歷史論集》（台北，幼獅文化，1992），第一章「歷史家與事實」。

註七一：李氏早在 1920 年發表的〈史觀〉一文已提出這樣的分法，《李大釗文集》（下），頁 266—267。

註七二：即李氏的「歷史的事實」其實以含有歷史解釋的意思，而卡耳的「歷史的事實」則是史家挑選的結果。至於「實在的事實」與「事實」則沒兩樣。詳見前兩文。

的虔信，對於「歷史解釋」可謂幾乎是完全摒棄。（註七三）如其謂「我們反對疏通，我們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註七四）這種說法恰好與李氏「只有充分的記錄，不算是歷史的真實；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是歷史的真實。」（註七五）截然相反。

李氏這種對「歷史的事實」的說法其實是含有後來史學中所謂「歷史解釋」的成分，而其將「歷史的真實」就等同於對「歷史事實的解喻」而這種對史實的解喻就是史實的知識，也就是「歷史觀」，而由於同一史實人人解釋不同、代代解釋也不同，甚至同一人對同一史實，在不同時期也可能會不同，這是因為「事實是死的，一成不變的，而解喻是活的，與時俱化的」（註七六）。所以「歷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註七七）而且因為「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歷史觀，一時代有一時代比較進步的知識；史觀與知識不斷的進步，人們對於歷史事實的解喻自然要不斷變動。」（註七八）李氏這種必須不斷重寫歷史的思想，許冠三雖認為有可能是得自克羅齊（B. Croce）之流學者的影響，但還是宣稱這在當時的中文述作中，這是前所未見的。（註七九）而這樣有相對主義色彩的史學思想，就可以解釋上一小節末有關「唯物史觀」與「歷史理論」的問題。即為何李氏一方面宗師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可是一方面卻又宣稱今日的「歷史理論」還在幼稚階段。這與他新史觀不斷替代舊史觀的想法有關，因為基於上述「史觀不斷進步說」（即「解喻與時俱化」），其雖宣稱今日「進化論的歷史觀，修正了退落說的歷史觀；社會的歷史觀，修正了英雄的歷史觀，經濟的歷史觀（即唯物史觀，筆者案），修正了政治的歷史觀；科學的歷史觀，修正了神學的歷史觀。」可是依照他「與時俱化」的說法邏輯推演的話，那是否明日的 XX 史觀會取代唯物史觀呢？（註八十）當然這種「史觀不斷進步說」並非只是從上述所推演出來，其實李氏也曾明文說明，其云「歷史觀本身亦有其歷史」、

註七三：這邊要說明的是，這樣的論說並無不是說傅氏本人的史學作品並沒有「歷史解釋」的成分，而是說他公開摒棄「歷史解釋」，不視其為史學的組成部份。

註七四：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集》（二），頁 976。

註七五：〈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17。

註七六：〈史觀〉，《李大釗文集》（下），頁 266—267。

註七七：〈史觀〉，《李大釗文集》（下），頁 267。

註七八：〈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 718。

註七九：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頁 20。

註八十：當然對於前面所提到的矛盾，其實也可有另一種解答，即其認為今日的歷史理論還處於幼稚期，指涉的是對象是今日的中國史學界。但從其上下文中，並無法看出這種明顯的指涉。

「所以歷史觀是隨時變化的，是生動無己的，是含有進步性的。」（註八一）而這樣的「史觀不斷進步說」，因此也造成了李氏史學思想與對「唯物史觀」的信奉中產生了某種的緊張矛盾現象。

（四）李氏史學的實際應用

以上三節主要是討論李氏史學的基本理念，本節主要為探討李氏史學在實際的歷史研究中，的成果為何，有何不足之處。

事實上，有關李氏史學實際研究的論文，相對於其發表有關史學性質的論文來說是少了許多，主要的論文有：〈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註八二）等。在這幾篇論文中，其主要的論點即是「物質和經濟可以決定思想、主義、哲學、宗教、道德、法制等，反之則不行」（註八三）如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中，其首先推論出說，「道德就是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之社會本能。」而道德的基礎就是自然、物質，就是生活的要求。然後李氏從「生產技術的進步」考察西方社會，從原始社會經希臘、羅馬、都市國家的興起以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宗教與哲學的發展。提出了相當多的看法，如其認為，「宗教改革運動乃是近世資本家階級自覺其經濟的實力的結果」；「現在的法律是階級的法律，政治是階級的政治，社會是階級的社會」，而考察的結果其認為「宗教、哲學都是隨物質變動而變動的。」（註八四）以下他又接著考察「風俗與習慣」與「政策與主義」的演進，結論同樣是因為有了「那種物質的要求，才有那種精神的道德的要求。」總結的說就是道德是隨著物質的變動而變的，而物質的變動就是生產技術的變動。

〈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中，他首先說明中國是以農立國，而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政治、法度、倫理、道德、學術、思想、風俗、習慣、都建築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層構造。在此他又提出孔子學說之所以能支配中國人心有兩千年，實因他是適應中國二千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然而「時代變了！西洋動的文明打進來了！」，因而「中國的農業經濟，既因受了重大的壓迫

註八一：〈史觀〉，《李大釗文集》（下），頁 266—267。

註八二：以上三文皆收入於《李大釗文集》（下）。

註八三：〈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李大釗文集》（下），頁 139。

註八四：〈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李大釗文集》（下），頁 139—143。

而生動搖，那麼首先崩頹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故李氏認為中國今日的種種思潮運動、解放運動，都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運動，也就是打破孔子主義的運動，如政治上的民主主義運動、社會上的種種解放運動、以及中國的勞動運動皆是。（註八五）

綜觀前兩文，可知李氏基本上是服膺他所理解的唯物史觀，即經濟基礎決定精神表層構造，精神層面只能隨著經濟基礎的演變而變。像這種一對一函數變化的說法，都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家所易犯的毛病。事實上所謂精神層面隨著經濟基礎演變的說法大致上是沒有多大的謬誤，但重點是「怎麼變」是馬上變，還是有更複雜呢？其實馬克思的說法是後者，其云：「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從這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馬克思是說「或慢或快」而非簡單的一對一演變。不過更重要的是馬克思認為「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積極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他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而言之，意識型態的形式。」（註八六）從這很明顯的可以看出馬克思認為這樣的變革是採取兩種方式的，一種是物質上明顯可察的，一種是人們「意識到」這樣的變革時，所採取的意識型態的形式去加以克服。而後者也就是馬克思的「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改變世界」思想的主要理論來源。（註八七）

由此可見，李氏的說法是稍嫌粗糙了些，有化約的色彩，不過，誠如前面所言，這都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易犯的毛病，倒不是李氏一人如此，而且雖然李氏說法是粗糙了些，然而對當時的史學研究無疑是開啓了另一種的「研究取向」，提供史學研究的另一個角度，從此研究所謂人類上層構造的種種形式，就無法避免甚至考量經濟所帶來的影響。而且另外如前面所談，李氏並不因此成為一個「經濟決定論」者，其反而掌握了馬克思「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的重要理念，也提出「歷史是由我們

註八五：〈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原因〉，《李大釗文集》（下），頁 178—183。

註八六：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頁 33。

註八七：如果說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就是「經濟決定論」的話，如何來「改變世界」呢？人們如何來創造自己的歷史呢？當然有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究竟如何，一直是馬克思與非馬克思主義者反覆辯駁不斷的課題之一，但從馬克思上述的引文中，我們可以確認馬克思並不是說一對一的變化關係，而且意識型態其實也扮演了某種角色。另要說明的是上述馬克思的說法其實也是引自李氏認為最能表示唯物史觀「公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並非李氏所未曾見過的馬克思文章。

自己創造的」說法(李氏指的我們是一般人民的意思,這與馬克思的人們是相同的,詳見前面第一節)。

不過,李氏除了對唯物史觀的掌握有些偏差外,其對實際的歷史研究還有一種缺點,即粗略的二分法。如新的、舊的。東方的、西方的。如其謂西洋的乃是動的文明、東洋文明則是靜的。東洋文明是農業本位文明、西洋文明是工商本位文明,而且是自東西有史即是如此。(註八八)另外是新、舊的區別,而且在新舊加上價值判斷的,謳歌新的道德、史觀,摒棄舊的如道德、史觀等。(註八九)這樣簡單的一刀兩斷法其實是不符合他自己所說先考察種種事實,再推論出一般歷史理論的說法。也就是並不是個嚴格的史學研究者該有的作法。

四、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從上述論述可知,李氏作為一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先驅者的角色是不容置疑,如其乃是第一位在大學院校開設唯物史觀研究、也是第一位以馬克思主義者身份研究從事史學研究。只是不幸的是,其於1927年為張作霖奉系政府所殺害,以致於不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再作出貢獻。不過在此想要討論的是,李氏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後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有否不同之處,主要以第二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郭沫若作為對照的分析。郭氏可謂是繼李氏之後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立下一個里程碑的人物,其主要著作《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於1930年出版後,在中國史學界引起極大的震撼,最後導致了1930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其說其著可以說使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又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以下就以李氏與郭氏的史學來加以比較分析,從中可以看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脈絡。

首先是兩者的理論來源,李氏在很多文章都重複唯物史觀的理論主要來自《〈經濟學批判〉序言》,而郭氏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主要的理論來源則有二:一也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一則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註九十)尤其是後者,郭氏認為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乃是恩格斯這部書的「續篇

」,因為恩格斯此書並沒有談到中國人。雙方基本上援引的理論來源並無很大的差別,而且對唯物史觀的理解也沒有很大的不同,也就「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範式,然而比較重要的是,郭氏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規定,提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說(也就是後來社會五個階段論),即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這是李氏從未提出的。而郭沫若藉由中國社會的發展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由此歸結及於中國未來的景況亦必如是:「社會是要由最後的階級無產者超克那資本家的階級,同時也就超克了階級的對立,超克了自己的階級而成為無階級的一個共同組織,這是明如觀火的事情,而且事實上已經在著著的實現了。」也就是說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與其他民族的社會發展並沒有不同,所謂的「國情不同」是一種偏見。(註九一)因為郭氏的這種說法,導致後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陷入了余英時所謂的兩個缺點:一是以外國的,主要是西方的歷史發展的抽象理論來籠罩中國歷史的實際進展。一是導致史學後來為政治現實服務。(註九二)而社會五個階段論成為後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所奉行的金科玉律。1930年代的社會史論戰,其實爭論的各方只是對於那一個階段是中國史上那個朝代的爭論,其基本論式還是籠罩在五個階段說裡面。

這也是陶希聖所批評的以「公式支配材料」,結果原本歷史考釋首應引據,重視的材料,然在公式的駕馭下,已然居於從屬的地位。因而在社會史論戰中,常常出現各說各話,以致動輒引「經典作家」:馬、恩、列的原典當成歷史的說明的現象,理所必然。此後,又隨著史達林在1930年代全面鞏固了他在蘇聯共黨中的領袖地位,毛澤東在1930年代逐漸躍升中共領導階層這般政治情勢的轉變,此兩人亦躋身「經典作家」的地位。史達林《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教條化地界定的人類歷史由原始公社制的生產關係演變至奴隸制生產關係,再進至封建生產關係,而後演進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最後進入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乃是一必然的趨向;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宣稱中華民族的發展與世界別的許多民族同樣,也經過原始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過程等觀點,更支配了此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整個發展。(註九三)而這樣的發展,郭沫若其實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註八八:〈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了原因〉,《李大釗文集》(下),頁177—178。

註八九:像新與舊、今與古、青年與老年,這樣的文章在李氏文集中,經常的出現,見《李大釗年譜》編寫組,《李大釗年譜》附錄二:李大釗著作目錄。

註九十:此書於1929年6月,楊賢江以筆名李鷹揚,依據英文譯本參照日譯本,將此書全譯成中文出版,得到相當熱烈的迴響,曾再版七次之多。參見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的討論》,頁23。

註九一: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的討論》,頁64。

註九二:余英時,《史學與傳統》,頁8—10。

註九三:潘光哲,《郭沫若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中心的討論》,頁180。

故簡而言之，李氏與郭氏的相同點乃是對於經濟基礎的變遷為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力，不同的乃是李氏從未提出所謂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定律，而郭氏卻提出了這樣的看法。郭氏會提出這樣的看法，原因除了對馬克思著作解讀的不同外，主要乃是當時馬克思主義的另一經典，恩格斯的《起源》一書當時正風行於中國，再加上郭氏本人的現實關懷，終於推出了所謂中國社會發展階段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一般歷史定律，而其後的中國馬克思史家基本上並無直接質疑其基本論點，只是每個人的分期方式有所不同罷了。（註九四）

五、結論

伊格斯（Georg G. Iggers）在考察 20 世紀歐洲史學的新趨勢時，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趨勢，作了提綱挈領的說明，其認為如馬克思、恩格斯、梅林（Franz Mehring）、繞勒斯（Jean Jaures）、列寧、托洛斯基（Trotsky）這樣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是曾居於黨內領導地位的政治家、活動家或者是宣傳家。他們都把歷史著作當作階級鬥爭的戰略工具。然自 20 世紀 20 年代和 30 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演變有了新的趨向，即馬克思主義史家逐漸加入了職業學者的團體，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史學日益由大學和研究所構成的職業史家撰寫，這在二次大戰後更為明顯。伊格斯認為這樣的職業化過程在共黨國家與非共黨國家所產生的結果是有所不同。不過基本上，伊格斯認為這種職業化的發展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與一般史學，其實是有益的，其云：「職業化總的來說也增進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對史學傳統研究方法的了解，也增進了對話的可能性，並使非馬克思主義史家認真的接受馬克思主義者向科學歷史傳統概念發起的挑戰。」（註九五）

反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李大釗所扮演的角色，卻將上述兩個階段的發展，幾乎合而為一，這當然也是李氏的特殊身份所導致的結果。怎麼說呢？也就是說李氏一方面作為一個大學教授，其將馬克思主義史學帶入了學院，也就是伊格

註九四：而自此後五個社會階段論就成了唯物史觀的主要理論之一了，雖然馬克思本人曾公開說明有人把他對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這「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污辱。」而且馬克思也批評一般的歷史哲學認為「這種歷史哲學理論的最大長處就在於它是超歷史的。」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頁 342。然而，早期尊奉馬克思的中國史家們，似乎並未見到馬克思的這段話。

註九五：Georg G. Iggers 著，趙世玲、趙世瑜譯，《歐洲史學新方向》（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頁 136—137。

斯所謂職業化的過程；然一方面李氏又是中國共產黨運動早期的領導人物，故也不免於以歷史分析作為運動的戰略工具。這種身兼兩種角色，的確也為李氏史學帶來了某種影響（詳後）。可惜的是，李氏自 1924 年為北洋政府所通緝後，其作為一個職業史家的角色，已為職業革命家所取代，不能再執行與其他非馬克思史家進行理論對話的機會了。而且由於李氏又身兼革命家的角色，其並無法全心全意投入對中國實際歷史之研究，尤其中國共產黨草創初期，其為北方的主要領導人，更是無力投入「純學術」的研究，以致於在實際歷史研究上的成果來說，總是相對的稀少許多，而且也較不嚴謹。（註九六）

總的來說，李氏的史學有三種主要的特色：一是唯物史觀、一是進化思想、一是對史學本質的考察。在唯物史觀方面，以經濟基礎／精神表層構造說為主，但有化約兩者之間關係的解釋，「物質決定精神」，有時會落於簡單的一對一變動。可是李氏又堅決否定唯物史觀是「經濟決定論」，反而認為唯物史觀是可以推出「人們創造自己歷史」。也如前章所言，由於對於理論字句的擷取，有些部份不同於後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故並沒有提出「社會五個階段論」，即所謂人類的一般歷史定律。也因此沒有落入了以「公式決定材料」的刻板解釋，因此我們可以大膽的結論說，雖然在實際的歷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李氏的確比不上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家如郭沫若等。但由於並未落入「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的窠臼中，而且又有人們創造自己歷史的主觀能動說，就某層面來說，其實，李氏遠比後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更接近馬克思本人的史學觀念。

而李氏的進化思想對其史學思想的影響可以說並不下於唯物史觀，甚至我們可以說李氏的唯物史觀事實上是統攝於「進化思想」之下的。李氏的進化思想主要是受嚴復的「天演說」的影響，可是李氏並非完全服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優勝劣

註九六：對於中國共產黨初創階段，李氏承受繁重的黨務的情形，可參閱當時與李氏同為中共北方領導人，情同師友的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第二篇、第三篇。在這值得注意的是，據張氏回憶，原本在 1920 年夏，李氏並無建黨的意圖，而且認為應先組織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且這個團體應「暫不過問實際政治」，除了研究翻譯介紹工作外，還應從事一些工人活動。而張氏也頗為贊成其說法，後來會組織中國共產黨，主要是陳獨秀的提倡。見上書，頁 86。此外，還可參閱，《李大釗傳》編寫組，《李大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五、六章。

敗」、「弱肉強食」主張。(註九七)對於達爾文的進化思想,李氏主要擷取部份是「不斷進步」觀念。這種進步觀不是單純的直線進步史觀,而且是一種「螺旋上升」的史觀,其云:「歷史的進路,縱然有時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狀的運動,但此亦是循環著前進、上升的,不是循環著停滯的亦不是循環著叛逆的、退落的,這樣子給我們一個進步的世界觀。」(註九八)

李氏史學的第三個特色,也就是對歷史本質的考察,這是李氏的一個相當有貢獻的地方,其仔細的提出對「歷史是什麼」、「歷史學是什麼」問題的解答,更是區分了「過去的事實」與「歷史的事實」不同之處;也提出「歷史解喻」與「歷史真實」的關係;釐清「歷史理論」、「歷史記述」、「歷史研究法」、「歷史哲學」之間的關係,甚至也提出了史家主觀與客觀的問題(註九九)以及「史學史」的概念。這些有關「歷史本質」的思考,是遠比其同時甚至之後的中國史家來的成熟的(如前兩章作為對照的傅斯年)。姑且不論李氏的說法是否完全正確,至少其能提出這麼多有關史學本質的問題,就是莫大的貢獻了。(註一〇〇)

前面已經談過李氏史學的特色與貢獻以及其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位置與影響。最後,筆者想要在更大的範圍,即在「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脈絡下來考察李氏史學的所代表的意義。在1949年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可以說經過三個重要的階段:第一是20世紀初梁啟超首倡新史學,所帶來的新史學思潮,此時的特色,主要是對中國傳統史學提出攻擊,然所引用的西方理論多是透過二手翻譯,零星片段不完整,沒有系統,各種史學觀點,各取所需,雜然並存。而且職業化的史家也還未出現。(註一〇一)第二階段是1920年代前後,這時中國現代史學的特色是,西方的史學理論已經可以直接翻譯,或由外國留學生帶回國內,故比較有系統有組織,而且這時另一個現代史學的指標即「學院化」的歷史學開始出現,也就是1919年由朱希祖出掌的北大歷史系開始開設有現代史學理論的課程,如何炳松所介紹美國

註九七:李氏甚至對於這樣的進化論提出批評,其云:「從前講天演化的,都說優勝劣敗、弱肉強食,你們應該犧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們優勝的地位你們應該當強者去食人,不要當弱者,當人家的肉。從今以後都曉得這話大錯知道生物的進化,不是靠競爭,乃是靠著互助。人類若想求生存、想享幸福,應該互相友愛,不該仗著強力互相殘殺。」(新紀元),《李大釗文集》(上),頁607。

註九八:〈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763—764。

註九九:有關李氏對史家主觀問題的探討,參見〈史學要論〉,《李大釗文集》(下),頁752。

註一〇〇:如果我們不把歷史學的領域,只限於對「實際歷史事件」的研究的話,李氏對史學本質的研究,其實成果遠較一般從事實際歷史研究的史家來的豐富的。

註一〇一:余旦初,《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89—91。

史家魯賓遜的「新史學」、李大釗開設的「唯物史觀」研究。這時對西方理論的掌握是遠較第一時期來的豐富、與準確,而且對史學本身的思考也較成熟些。可是仍呈各種理論競逐的場面,而這些理論中最重要的有二:一就是李氏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一是傅斯年所代表的「蘭克科學派史學」(註一〇二)。到了第三階段:也就是到了1930年代,史料與史觀學派的對立就成為今後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特色了,由於後來兩者都掌握了中國現代史學的主要傳播研究機構,所以後來雖有不同於兩者的史學理論的出現,例如錢穆等,但始終只能處於史學界的邊緣位置。到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無限上綱指導原則,甚至最後成為了「影射史學」,直到了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對史學研究的限制才稍微有些鬆綁,不過至今仍難跳脫「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臺灣現代史學的發展,誠如前所言主要為傅斯年為首的史料學派所佔據,這種獨佔的局面直到1970年代,由於社會科學的影響才有稍許的改變,至今「史料學派」的觀點,其實還是大多數史家的觀點,以致大多數史家多避談理論,甚至對史學本身的研究思考也相當的缺少。(註一〇三)

從上述整個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演變上,可以看出李大釗其實處於第二階段的關鍵位置上,然而,筆者認為李大釗除了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傳播建立有開創之功外,其本身對史學本質的探討,其實是他留給中國現代史學一個重要的遺產,這是我們後來的史學工作者值得借鏡以及再加以研究思考之處。最後僅以李氏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語。「只有充分的記錄,不算歷史的真實;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是歷史的真實。」

註一〇二:這裡之所以以「蘭克科學派史學」為名,並非筆者認為蘭克是科學派史學,這種「蘭克幻象」的認識早由伊格斯(Iggers)所提出,見氏著,蒲慕州譯,〈蘭克史學的理論與實際〉緒論,《食貨月刊》,頁25。不過,傅斯年事實上所繼承的蘭克史學即是科學派史學。「科學派史家,大都相信史家的工作是以「客觀」為最高職志,而且「客觀」的知識是可以達到的。這一派學者盡心收集史料,借重歷史語言考證技巧,從事專題研究,其目的無不在追求所謂「客觀」的知識。」上述這段話,乃是周樑楷師對19世紀下半葉歐洲的科學派史家主張的說明,見氏著,《近代歐洲史家及史學思想》(台北,唐山出版社,1992,增定版),頁4。同樣的意義,也可見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

註一〇三:基本上,黃俊傑認為1950到1970的二十年之間,對歷史研究方法最具有支配力,在方法論上最具有影響力的是史料學派,尤其是德國的語文考據學派的研究方法論。直到1971年後史學工作者則受到歐美以實證主義為中心的社會科學的衝擊,促成研究方法的新取向出現。參閱,氏著,〈三十年來史學方法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1950-1980)〉,收入賴澤涵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163—165。